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重要读本

关键词 思想政治工作 方法论 创新发展

○马慧芳 阴耀华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是关键。只有掌握和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和实效性。近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论》一书。该书对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战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第一，对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

该书归纳、总结和凝练了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中运用的方法，以理念方法、原则方法、基本方法、具体方法为主要分类，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对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论研究具有积极推进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论是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从理论上探究和分析了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内涵、意义和实践要求等，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对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论》刘建军、张苗苗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25年2月版/58.00元
ISBN：9787202173633

第二，对开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而适合的教育方法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该书不仅对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方法、原则方法做了归纳总结和阐释解读，更凝练了历史教育、学思践悟、问题导向、知行合一等基本方法，特别是给出了把好“总开关”、坚守“主阵地”、扩大“同心圆”、打通“最后一公里”等具体方法。这些方法有助于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工作尤其是基层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能够有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开创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

第三，对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阐释和传播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该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为依据，内容深入浅出，语言通俗易懂，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帮助读者在学懂弄通、明理明道中领悟思想深度，在联系实际、引领实践中彰显思想力度，在用情用心、入脑入心中体现思想温度，不断深化对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把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引向深入，并为他们在解决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思路启示。

综上，《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论》一书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重要的实践价值和重要的社会价值，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者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特点和战略方法，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斗志、团结奋斗的重要作用，推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发展。

货担上的微观史：放大镜式多元解码《货郎图》

关键词 货郎图 图像学 社会史

○李一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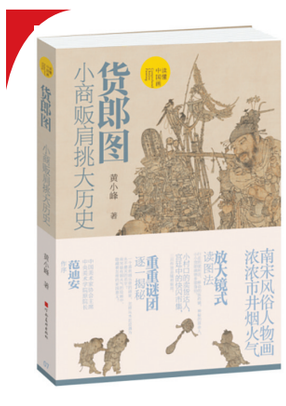
南宋时期，一位木匠出身的“平庸”画家，却为美术史贡献出了精彩的四件作品，这就是李嵩的“货郎图”系列。四件“货郎图”都不是鸿篇巨制，其中一幅是小横卷，三幅是扇面。它们也都不讲王侯将相的宏大叙事，而是将目光聚焦在小小人物货郎身上。这些尺幅不过盈尺的画作，在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货郎图：小商贩肩挑大历史》中，被作者黄小峰教授以放大镜式超细读的研究拆解重构，该书入选了“中国好书2025年1~2月月度好书”榜单。翻开这本书，就像拿到了一串钥匙，让我们逐一打开通往宋代历史与生活的大门，揭开那掩藏在画中的重重谜团。

放大镜式痴读图像，细数“三百件”

在《货郎图》画作上，乾隆皇帝题跋有一句诗：“莫笑货郎痴已甚，世人谁不似其痴”。对身背的“三百件”货物痴迷的不仅是货郎，还有该书作者黄小峰。黄小峰在自序中提到，这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像迷宫让他痴迷不已，从20年前最早关注到《货郎图》到如今这本书的诞生，“货郎图”有太多值得研究的谜题。

如果你看到过李嵩的《货郎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你会发现，画中的货郎身背琳琅满目的货品，就像一个移动便利店一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取出你想要的物件。那么，这个货郎身上，到底背了多少货品，它们都是些什么东西？

黄老师开篇首先作出了图像细读。他以5个观察视角，即货郎身上的货物、担杆上的货物、背面货篮、正面货篮、正面货篮的顶部与侧面，对货郎进行细致观察。这份超详细的“三百件”货品清单背后，是作者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全书细读图像研究方法的集中表现。当黄小峰以手持放大镜式的观察方法读图时，那些隐藏在画面细微之处的信息便显现出来了。为了让读者看得清、读得懂这些信息，这本书在编排上也是煞费苦心。纵观全书，每每解读至细微之处，都配合有高清局部放大图，图与文的结合足够严丝合缝，使读者得以沉浸式体验“三百件”的视觉盛宴。



《货郎图：小商贩肩挑大历史》黄小峰著/河南美术出版社2024年12月版/88.00元
ISBN：9787540167981

从图像学到社会史：多元视角解密小货郎

细数了“三百件”之后，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位货郎究竟身兼多少种职业？在第二章至第六章中，作者运用经济学、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视角，结合细读出的纷繁线索，逐步揭示出货郎身份的复杂性。

从货品品类之丰富不难看出，这位货郎看似只是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实则肩负着多种职业属性。行文至此，“货郎图”已经完成了从图像史到社会史，从小人物到大历史的追踪。通过5个章节的抽丝剥茧，黄小峰构建起清晰的跨学科的分析框架，将图像学研究推向了社会史阐释的新维度。这种方法论突破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以经济学视角切入宋代专卖制度，通过“山东黄米酒”旗幌与“酸醋”葫芦等物证，揭示货郎作为特许经销商的特殊身份，其货担实则是国家垄断商品流通体系的缩影；其次，运用医学史方法解码货郎腰间“病”字圆牌与货架上的动物药材，结合《清明上河图》中的“赵太丞家”药铺等旁证说明其行医模式；再者，通过民俗学视野考察儿童玩具的象征意义，将迷你农具、文具与抓周礼俗相勾连，展现出宋代教育理念。

这种多学科互证的研究范式，突破了传统美术史“以画论画”的局限，不仅为美术史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更开创了“以图像证史”的典范，使读者逐步从医药、祭祀、买卖制度等角度明晰了这位小货郎背后的宋代社会生动的面貌。

真实与虚构的交织

在随作者细读了货郎担上的种种货品后，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这幅画里的货郎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货郎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黄小峰已经在第七、第八章中给出了结论。不论是对比其他画作文献中所描绘与记载的货郎形象，还是对货郎担的考证，都指向一个答案：这位货郎似乎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而是带有节日表演属性的货郎。

那么，这个不那么真实，带有虚构性质的“货郎图”的受众又是谁？其实，在前面的细读图像过程中，黄小峰已经给出了提示。不论是货架上种种儿童用品，还是画面本身围绕在货郎身边的母亲与儿童的形象，甚至图像的形制（画扇）都指向了这个画题的理想观看者，即女性与儿童。这幅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亲子阅读的空间，不论画里画外，女性都起着陪伴与教育儿童的重要作用。

回顾跟随作者的读画之旅，从货担上的一方招幌追溯到宋代商品贸易网络，从一枚头骨追问货郎的多重身份，从儿童玩具解读宋代教育理念，“货郎图”已然超越了画作本身，成为历史文化与艺术的一个缩影。那小小的货郎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深刻印记，让后人在每一次凝视这些画作时，都始终牢记，物品的背后是人，是国家，是社会。

资讯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服务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启动

实施方案论证会在京举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4月11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化科技与现代服务业”重点专项“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服务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在京举行，会议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中宣部文化改革发展局、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以及数十位来自科研院所、出版企业、高校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与会人员围绕项目实施方案，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专业知识服务领域的创新应用与发展路径进行了研讨论证。

据了解，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刻改变出版业生态格局的背景下，为推动出版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联合同方知网、北京邮电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石化出版社、研究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武汉理工数传集团、北京数字跃动科技公司8家单位，共同申报并获批2024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化科技与现代服务业”重点专项“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服务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

会上，项目责任专家与项目咨询专家等对项目研究目标、技术路线及预期成果进行了研讨论证。他们表示，该项目将通过研发生成式AI在专业知识服务领域的垂直大模型构建和可信服务等关键技术，推动出版业从内容供给向知识赋能升级。同时计划经过3年的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形成系列预期成果，包括研制人工智能专业知识服务系列国家标准，构建支持多方协同共建的知识数据池，发布百亿级参数垂直领域大模型，研发检索增强生成技术工具，建设交互式知识服务平台，形成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服务新模式。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冯士新表示，项目启动标志着我国出版业人工智能技术有组织的研发进入新阶段。该项目通过前沿技术联合攻关，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将推动出版业数智化转型升级，以自主研发的AI技术与应用打造知识服务新范式，助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茜）

一本书读懂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之根源

关键词 早期中国 文化 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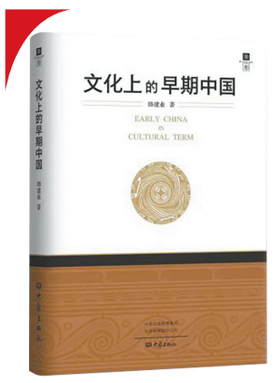
○徐紫瑾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是韩建业用力最深，成果最多，也最能串联其学术旨趣的研究领域之一。他早在200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就有“早期‘中国文化共同体’或‘中国文化圈’”的提法。2015年《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出版，是对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但仍留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后韩建业继续在相关领域精耕细作，形成了多篇专题性文章。此次《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编辑出版，收录了这些最新文章，及之前发表的小部分重要文章共计18篇，为读者认识、理解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提供了新的契机。该书探讨的问题众多，主要可以囊括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演变脉络，不同时期的格局，以及形成、变迁的机制三个方面，兼有对关键概念和方法论的讨论。

申明“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内涵和外延

“早期中国”或“最早的中国”是学界长期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不同学者对“早期中国”的界定、形成时间、空间范围及文化特征等问题有多样化的解读。该书首要申明了究竟什么是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其和政治上的早期中国、中华文明的关系。

不同于狭义的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或与“野蛮”相对的高级社会阶段或国家阶段，韩建业更赞同一种综合的观点，即文明是进入国家阶段后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其正式形成以最早国家的出现为标志。所谓中华文明，一定程度上对应进入国家阶段的“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的中国”。具体来看，距今8000多年进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距今6000年进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距今5100年中华文明正式形成并进入“古国”时代，距今4000年进入“王国”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与早期国家、“政治上的早期中国”相关但却有别。中国最早国家的形式是拥有区域王权的“古国”或“邦国”，而政治上的早期中国更强调统一的天下王权，其形成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王国时代”。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政治上的中国有合有分，当其强盛之时，范围与中华文明大体重合，但多数时候不及后者辐射范围之广阔，延续之稳定。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韩建业著/大象出版社2025年1月版/89.00元
ISBN：9787571119324

厘清关键节点和文化格局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发端于何时，不同时期特征如何，又如何变迁发展，是该书讨论的另一重要主题。该书前8篇论文是对不同时期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分述，第9到11篇则是综论。

该书再次强调在“早期中国”文化整合的过程中，黄河中游尤其是中原地区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诚然，因为对“中原”这一地理范围的具体界定不同，或因对不同地区早期文化特征和地位的认识不同，一些学者并不同意过度强调中原地区的独特地位。但在裴李岗时代和庙底沟时代等多个关键历史阶段，黄河中游地区无疑是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最充分、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各个小区域彼此交织、关系最密切的地区，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早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形成了周期性的“分”“合”现象。但总体来看，兼具“北方模式”和“东方模式”之长的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厚积薄发的态势，不但在龙山时代全面超越其他地区，更在二里头时期形成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广幅王权国家。因此，可以说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确具有一定的中心地位，是多支一体中华文明的主根脉所在。

概括总体格局和“天下文明”模式

对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总体格局的概括和“天下文明”模式的提出，是该书的另一重要成果。第10篇论文《最早中国：多元一体早期中国的形成》使用的是“多元一体”概念，而第14篇论文《论早期中国的“一支多元一体”格局》则使用了“一元多支一体”概念，表明韩建业对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格局的认识发生了改变。

两者概念的核心区别在于对“元”的理解不同。按书中所说，“一元”的“元”本义为人首，引申为肇始本原。以往的“多元一体”概念中的“元”指的是族群或者考古学文化。韩建业认为，元即为根本之意，则早期文化中国、早期中华文明或者早期中华民族的根本应该是那些长久传承不易改变的思想文化观念，而非易变的物质文化和族群等。

“多支”和“一体”概念也有作者研究的侧重点。“多支”不仅表现在“多元”所指的多个文化样貌或者支系，更表现在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的多种路径或者子模式。“一体”更倾向于是有中心、多层次的一体格局，特别强调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中心作用。这种“一元多支一体”文化发展格局相较于世界上其他文明发展模式，有其独特的稳定性和包容性，被作者称之“天下文明”模式。

“一元多支一体”相较于“多元一体”更加强调思想观念和文化基因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深度凝聚作用，侧重于挖掘中华文明突出的内在特性和精神内核，旨在揭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最本质差异。正是这种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的延续，成为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内在动力，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的时候向往统一、统一的时候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因此，可以说“一元多支一体”是对“多元一体”格局的补充和完善。

该书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提出，可以说既是史前考古材料所体现的统一性特征使然，又是认识中华民族绵续几千年之根源的必然要求。它是作者的学术关怀和学术成果的集中体现。

当然，该书也并未解决有关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所有问题。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提出的“是否能从物质文化遗存归纳出精神文化层面的特质或者文化基因，‘一元多支一体’的提法是否比‘多元一体’更合适，距今8000年前、6000年前是否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两个关键阶段，政治上的早期中国是否起源于轩辕黄帝时期、形成于夏”都还是有争议的。但这些问题同时也构成了“新的学术增长点”，是考古学界及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学者们可以不断深耕和完善的学术研究领域。该书收录的文章完成时间前后有别，作者的观点也随时间变化有所调整，值得仔细咂摸。不过编者没有标注每篇文章的出处，不能不说是一个小的缺憾。

该书不仅是韩建业学术研究心路历程的生动写照，还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深度，是一本值得仔细阅读的学术佳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